

[Studies in Literature]

# Transnational Trauma and Politics in Phil Klay's Post-9/11 War Novel *Redeployment*

LIU Shixian

Nanjing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October 18, 2022

Accepted: November 20, 2022

Published: June 30, 2023

**To cite this article:** LIU Shixian. (2023). Transnational Trauma and Politics in Phil Klay's Post-9/11 War Novel *Redeployment*.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 (2), 029–038, DOI: [10.53789/j.1653-0465.2023.0302.005](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2.005)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2.005>

**Abstract:** Phil Klay's short story collection *Redeployment* is considered a quintessential literary text for the U. S. wars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and won the 2014 National Book Award for fiction. This study argues that it gestures beyond the narrow American war frame to show both the physical and cultural trauma of nonwhite Other in wars during the post-9/11 era; meanwhile, Klay subverts and deconstructs the myth of trauma hero, truly representing soldiers' anxiety and trauma about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enemies, wars, and national power. In Klay's view, the disillusionment of the American myth of "city upon a hill" projects intense political crises and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cluding the civilian-military divide, racial conflicts, and the loss of national faith and security. And America's way of democracy reconstruc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s colored by ethnocentrism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thus further questioning the rationality and justice of the U. S. global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ies.

**Keywords:** Phil Klay; *Redeployment*; transnational trauma; post-9/11; politics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LIU Shixian is a Ph. D. candidate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Nanjing University with academic interest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Her e-mail address is 770711337@qq.com.

# 克萊「後 9·11」戰爭小說《重新派遣》中的 跨國創傷與政治

劉詩嫻

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

**摘要：**當代美國作家菲爾·克萊的短篇小說集《重新派遣》獲得 2014 年美國國家圖書獎，被認為是反映美國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標杆式作品」。本文認為，小說突破了以往美國戰爭文學中的單邊創傷敘事框架，展現出「後 9·11」時代伊拉克平民遭受的跨國的戰爭和文化創傷。同時，小說顛覆和解構了傳統的創傷英雄神話，表現出跨國戰爭中美軍士兵遭受自我與敵人、戰爭和國家權力關係的焦慮與創傷。在克萊看來，「後 9·11」時代，「山巔之城」神話的隕落投射出美國國內愈演愈烈的軍民分隔、種族矛盾與國家信仰和安全感喪失的政治危機，並且，美國對中東地區實施的「民主解放與改造」帶有明顯的民族優越感和文化帝國主義色彩，進一步質疑了反恐戰爭的合理性和正義性。

**關鍵詞：**菲爾·克萊；《重新派遣》；創傷政治；「後 9·11」

## 引言

新世紀伊始，「9·11」恐怖襲擊事件震驚世界，美國國內對此旋即開展了積極的文學回應和文化批評，「創傷」逐漸構成美國當代情感結構的決定因素之一。2001 年，美國政府以「9·11 事件」為契機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區，跨入漫長的反恐戰爭歷程。然而，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文學的「黃金時代」卻姍姍來遲<sup>①</sup>。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是反恐戰爭自身的性質和時間的不確定性。它沒有可預見的結局，也「難以勾勒其敘事輪廓或形成具象表徵」<sup>②</sup>，進而難以觸發任何持續的文化反思的可能。其二是戰爭敘事的審美再現與倫理困境。一方面，相較於過往帝國主義式連貫歷史敘事，當代美國戰爭文化難以協調「戰爭話語的文化權威」與「國內暴力表徵的平庸化及其對伊拉克和阿富汗衝突的高度不平衡式再現」之間的矛盾<sup>③</sup>。另一方面，當代戰爭文學敘事面臨忠實地「見證和記錄」與「再現創傷暴力的不可能性」之間的挑戰<sup>④</sup>。面對上述戰爭創傷的難以言說性與倫理訴求的困境，柏林格 (Levi Bollinger) 堅信我們仍需要持續不斷地創作，尤其鼓勵文學作品使讀者「直面戰爭對立面的伊拉克」<sup>⑤</sup>。

2014 年，當代美國作家菲爾·克萊 (Phil Klay) 憑藉短篇小說集《重新派遣》(Redeployment) 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小說集共十二個短篇，採用了巴赫金式的複調敘事結構展現了反恐戰爭期間及戰後美軍士兵與伊拉克平民生活的真實場景，繪製出當代美國在中東地區戰爭衝突的微觀全景圖。評論界普遍認為《重新派遣》是反映美國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標杆式作品」。安東尼·沙利文 (Antony T. Sullivan) 評論該小說敏銳地關注到了伊拉克戰爭的跨國特徵，它直面「兩個世界之間的不可理解性與不相容性」<sup>⑥</sup>。迪爾從敘事學角度出發，指出小說「充滿了灰暗諷刺，並伴隨著以自私自利的諷刺邏輯為特徵的康拉德式審問。」<sup>⑦</sup>中國學界也不乏對小說進行相關研究論述，從戰爭審美角度探究當代美國戰爭文化的新表徵和特點<sup>⑧</sup>。從文學

倫理學批評維度觀照作品如何「尋求戰爭經驗和日常生活交流潛能與道德對話」<sup>⑨</sup>。景觀美學則認為，當代美國戰爭小說中以「視覺政治」為主導的「主體性景觀」成為一種消費符號及權力和意識形態的直接表徵<sup>⑩</sup>。然而，鮮有學者進一步探究小說如何還原戰爭創傷的異質性和交互性本質？如何展演滲透在反恐戰爭框架中的「美國意識」及政治現實？本文借助文學創傷理論對上述問題進行分析，認為克萊在《重新派遣》中重新審視了「後 9·11」時代美國軍事介入中東地區所造成的跨國與跨文化的戰爭創傷。在他看來，「後 9·11」時代，「山巔之城」神話的隕落投射出美國國內愈演愈烈的軍民分隔、種族矛盾與國家信仰和安全感喪失的政治危機，並且，美國對中東地區實施的「民主解放與改造」帶有明顯的民族優越感和文化帝國主義色彩，進一步質疑了反恐戰爭的合理性和正義性。

## 一、跨越疆界：伊拉克平民的戰爭與文化創傷

20 世紀 90 年代興起的創傷研究已經逐漸成為理解當代文化及文學敘事最普遍、最有效的認知框架之一。正如盧克赫斯特 (Roger Luckhurst) 認為，「9·11 事件」之後，所有奇異的、空前的語言都驚人地易於在創傷範式下敘事<sup>⑪</sup>，揭示出創傷成為美國社會文化的「能指」。然而，女性主義心理學家勞拉·布朗 (Laura S. Brown) 卻指出其局限性，它將「人類的經驗範圍變成了統治階級男性生活中正常和普遍的範圍；即白人、年輕、身體健康、受過教育、中產階級、基督徒男性。因此，創傷是擾亂這些特定人生的東西，而不是其他。」<sup>⑫</sup> 同樣，在對虛構類文學作品的研究中，杜瓦爾和馬爾澤克 (Duvall & Marzec) 也撰文總結災難發生後十年的大部分美國「9·11」小說主要聚焦於美國國內享有特權的紐約白人如何通過對他們的人際關係如婚姻、親情等進行自我反思和道德救贖，並得出結論「『9·11』最終只是一個促使我們努力改善人際關係的事件」<sup>⑬</sup>。學者們轉而質疑作家這種匱乏的文學想像力或致使對災難性公共事件的文學反應落入西方中心主義式創傷敘事的窠臼，「那些在西方被歸類為「他者」的、被壓迫的主體的痛苦，往往難以通過創傷理論來解決」<sup>⑭</sup>。由此，「後 9·11」小說的創傷書寫也面臨亟需一種新的文學範式與認知框架的挑戰，進而生成新的「後 9·11」文學生命形式。

如何走向一種「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 的他者創傷寫作？如何擺脫中產階級家庭生活中的西方中心主義短視？格雷 (Richard Gray) 肯定了作為一種批判性多元文化主義的美國族裔文學寫作經驗，認為「後 9·11」文學應效仿觸及非美國的「他者性」(otherness)，力圖開拓並融匯美國多元文化的內部差異，從而「重新裝配語言、美國文學的主題與修辭」<sup>⑮</sup>。邁克爾·羅斯伯格 (Michael Rothberg) 則走的更遠，他希望能看到一種離心式的、注重「國際關係及域外公民身份」的「後 9·11」小說，從而超越民族國家的界限來繪製美國的「域外認知地圖」，重新修復美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接觸與聯繫<sup>⑯</sup>。克萊在《重新派遣》中採用了「解域化」的寫作方式回應了上述多元文化和世界主義敘事的呼籲，通過呈現國族、宗教或文化意義上的「非西方」他者的創傷，不僅拒絕美國官方及主流媒體常見的反恐戰爭二元論：西方和東方，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我們和他們；而且避免了「後 9·11」創傷審美易落入去政治化、去歷史化的窠臼，或是習慣性的民族主義自戀陷阱，進而引導讀者思考「作用於二十一世紀人類主體性構成中的更大的全球力量」<sup>⑰</sup>。

人類學家維托維克 (Steven Vertovec) 認為，跨國主義 (Transnationalism) 泛指「將人們或者機構跨越國界地聯繫在一起的紐帶和互動關係」<sup>⑱</sup>，這種跨越國界的網路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和持續性，並由此產生各種互動或交換關係。筆者認為，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本質上屬於一種跨國的軍事實踐，其間，美國與中東地區形成政治、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態等多重跨國網路與空間，深刻改變了中東的地緣政治格局。正如印度作家阿蘭達蒂·羅伊 (Arundhati Roy) 在小說《極樂之邦》(The Ministry of Utmost Happiness, 2017) 中提到「9·11」



帶來的地緣政治事件：「雙子塔倒塌後，舊德裏充斥著逃離戰機的阿富汗家庭，戰機在他們的天空中像不合時宜的蚊子一樣歌唱，炸彈像鋼雨一樣落下。」<sup>19</sup>在《重新派遣》中，克萊也逃逸於美國傳統的以白人男性士兵為中心的敘事框架，重疊交織出美國軍事入侵給伊拉克或阿富汗平民帶來的戰爭創傷，還原創傷的異質性與交互性本質。在短篇《火窯中的祈禱》中，敘述者轉述了一位伊拉克平民的遭遇，後者因美國入侵造成的動亂而痛失幼子，他在巴格達的親戚也被美軍活活折磨致死，「有一天他和妻子看電視時，一群美國人踢開他的門，抓著他妻子的頭髮將她拖出去，在他自己的客廳裏毆打他。他們用步槍戳他的臉，踢他的肋部，用他無法理解的語言向他大吼。他無法回答他們的問題，他們便打他。」<sup>20</sup>克萊以伊拉克平民的視角「解域化」地呈現出戰爭中「他者」的生理創傷。直觀的駭人場景凸顯了無辜平民在非人的戰場上的脆弱與無助。他們的意外傷亡被美軍視為反恐行動中不可避免的「附帶損害」(collateral damage)或是衝突的「副產品」(byproducts)<sup>21</sup>，這嚴重侵犯了伊拉克人民的生命權和生存權。據美國布朗大學沃森研究所「戰爭成本」(Cost of War)專案統計，美國在反恐戰爭中至少造成了 31 萬到 33 萬無辜平民死亡。哈米德也曾在《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2007)中描述美國對阿富汗的瘋狂轟炸「新聞畫面裏，擁有二十一世紀最先進武器的美國轟炸機和地面上裝備簡陋、食不果腹的阿富汗部落男子形成了近乎荒誕的對比。」<sup>22</sup>並且，戰爭暴力還造成難以治癒的心理創傷。赫爾曼(Judith Herman)認為「心理創傷的痛苦源於無力感。在受創當時，受害者籠罩在無法抵抗的力量下而感到無助……破壞了普通人對生活的適應」<sup>23</sup>。故事中的這位伊拉克平民在美軍入侵時，無力挽救妻兒免受暴力毆打或生命威脅，強烈的無助感演變為心理創傷，「現在他上街時提心吊膽，害怕無緣無故喪命」<sup>24</sup>，對周遭的環境異常警覺。戰爭暴力的不可預知性與不可控性充斥著無辜平民的日常生活，模糊了「戰時狀態」與「平時狀態」的時空界限，致使他們患上「焦慮」、「麻木」和「震驚」等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sup>25</sup>，難以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

其次，克萊並未囿於卡魯斯和赫爾曼等人去政治化、去歷史化的創傷本體論思維，而是將伊拉克平民的戰爭創傷進一步語境化，探尋其背後的政治壓迫與經濟控制等社會誘因。在第六個短篇《金錢作為一種武器系統》中，克萊借敘述者之口講述了美國如何摧毀伊拉克原有的政治和經濟體系，全面破壞當地的經濟、農業和工業等各個領域：美國在戰爭伊始就極力將政權拆分到多個政黨手中，並默許各派別驅逐主張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舊技術官僚，擁護黨派傀儡瓜分伊拉克。在經濟上，美國廢棄了伊拉克原有的國營工業，採用市場經濟原理改造農業部，結果導致整個經濟系統的崩潰，「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開始四處埋炸彈。」故事中，當地的翻譯員指責美國人「搞垮了」自己的國家：「你們把伊拉克烤成了蛋糕，然後送到伊朗嘴邊」。診所社工娜吉達坦言：「我是伊拉克人，我習慣了善意但無法兌現的承諾。」<sup>26</sup>克萊試圖將伊拉克人的集體記憶帶到讀者面前，去客觀地還原一段美國疆域及文學視野之外的戰爭歷史，使讀者得以窺見「9·11」與反恐戰爭從作為因果關係的「事件」<sup>27</sup>轉變為影響東方與西方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關係的禍源。

再者，克萊還批評了美軍的種族主義與文化殖民給伊拉克人民帶去的文化創傷。傑弗裏·亞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從集體的文化記憶出發提出「當一個集體的成員感到他們遭受了一個可怕的事件，在他們的群體意識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永遠地銘刻在他們的記憶中，根本且無可逆轉地改變了他們未來的身份時，文化創傷就發生了」<sup>28</sup>。事實上，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人不僅把伊拉克或阿富汗等地當作市場與地緣政治的棋盤，還將其劃為意識形態的轄域，企圖繼續他們在精神與思想上的統治。小說中，美國士兵用穆斯林尊稱或阿拉伯語貶損辱罵伊拉克民族與宗教文化，無辜平民被統稱為這個「混賬國家中最愚蠢的笨蛋哈吉」<sup>29</sup>。專業心理戰軍士策略性挑選「鞋」、「包皮」等阿拉伯語中最具侮辱性辭彙挑釁當地的原教旨主義者。負責資助美軍的吉恩·古德溫老闆寫郵件提議在伊拉克推廣美國的棒球文化以改造伊拉克的國民精神：「伊拉克人民渴望民主，但民主無法紮根。為什麼？因為他們沒有必要的機構作為支持。在腐爛的

地基上你什麼也建不了。而伊拉克文化,我敢肯定,已經不能更腐爛了。你必須從改變文化入手。還有什麼比棒球更能代表美國呢?」<sup>31</sup>克萊在此諷喻將伊拉克民族的「落後」歸咎於文化腐朽是一種典型的西方啟蒙式民族主義偏見,它塑造了美國人強烈的民族優越感,極大地遮蔽了公眾對於他人尤其是被入侵國家受害者所受苦難的認識;另一方面,在民主與野蠻、先進與落後、西方與東方的文明優劣論中還暗含著一種更為隱蔽的文化帝國主義野心,它作為美國官方言論之下的「隱性進程」,企圖借助培植民主機構與傳播西方的民主價值觀以改造伊拉克人民的公眾意識,實現強勢文明對弱勢文明的「文化殖民」,造成了伊拉克人民集體的文化創傷。

## 二、「反創傷英雄神話」:美軍士兵的道德焦慮與身份危機

「創傷英雄神話」(myth of trauma hero)是美國戰爭文學中常見的敘事原型:年輕的白人男性士兵懷揣對榮耀、勇氣和犧牲的浪漫幻想奔赴戰場;在殊死戰鬥中喪失天真,遭受生離死別;帶著難以言說的戰爭經驗和不被理解的心理創傷離開或被困於戰場,永遠與和平世界隔絕<sup>32</sup>。從克萊恩的內戰小說《紅色英勇勳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到海明威的一戰小說《永別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再到奧布萊恩的越戰小說《士兵的重負》(*The Things They Carried*),無數以此為原型的經典戰爭小說烙印在一代代美國人的集體記憶之中,影響並塑造著美國的戰爭意識與文學視野。斯克蘭頓尖銳地批評了這類神話的自戀現象,它將戰爭文學從作為「理解現實的框架」轉變為只反映美國人「個人期望的鏡像」<sup>33</sup>。有學者也擔憂這種「士兵的意識即是戰場」的自滿模式或招致恐怖主義戰爭的爆發<sup>34</sup>。克萊在小說中力圖顛覆和解構這種創傷英雄敘事框架,呈現出士兵在反恐戰場上的倫理困境:現代戰爭的暴力性和肉體的脆弱性使美軍陷入一種既對「他者」進行支配地、暴力地凝視,又對「他者」的創傷產生移情認同的倫理困境,進而造成了其對自我與敵人、戰爭和國家權力關係的不安,折射出美軍士兵深重的道德焦慮與身份危機。

這種內心強烈的道德衝突在《行動報告》這個短篇中表現得最為直接和有力。美軍士兵提姆赫德在汽車爆炸的慌亂中失手射殺了當地一個十三四歲的伊拉克兒童:孩子「汨汨地流著血……孩子的母親沖出來想把他拉回房裏。她卻正好目睹兒子的血肉從他肩後飛濺而出。」<sup>35</sup>小說此處以一種完全聚焦的攝影式敘述呈現出一具垂死的肉身,凸顯肉體的脆弱性和易受暴力傷害的特質。戰鬥結束後,提姆赫德多次否認誤殺行為,並向隊友吐露內心的道德折磨:「我受不了的是,他的家裏人都在場。就在眼前。他的兄弟姐妹都趴在窗戶上。他們看見了我,其中有個小女孩,大概九歲。我也有個小妹妹。」<sup>36</sup>提姆赫德的背景故事講述將男孩置於家庭敘事的軌跡中,成為親情的聯結體。無疑,他將伊拉克男孩視為一種自我身份的投射,展現出他對於敵我關係的焦慮與內疚。在列維納斯看來,「自我無法獨自生存,自我無法從孑然一身的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中獲得意義。」<sup>37</sup>克萊擺脫了美國剛愎自用的防禦性敘事視角,主動呈現出「他者」的生命活動與主體所產生的意義聯結與道德焦慮,「面孔」(le visage)的脆弱性成為血肉之軀互相殘殺的轉捩點,召喚著主體對「他者」承擔倫理責任,展現出作者強烈的文學倫理關照。

小說還表徵了「創傷英雄」敘事框架對美國戰爭小說中頑固的民族主義傾向和支配性男性氣質的強化,從政治視角揭示出美國戰爭知識體系背後的國家權力和利害關係。在《戰爭論》(*On War*)中,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Karl von Clausewitz)曾提出著名的命題「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延續」<sup>38</sup>。換言之,國家權力和意識形態正是以促進「戰爭框架」(frame of wars)的方式實現其政治目的<sup>39</sup>,而創傷理論則提供了「絕妙的契機」。正如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所言,民族主義「常常是創傷的產物」<sup>40</sup>。小說《重新派遣》中多次描寫到美軍將「勳章」、「國旗」、「軍服」和「葬禮」等意象與榮耀、犧牲等愛國主義價值觀相聯系,作為想

像的符號產生規訓力量。在新兵訓練營裏，教官會一遍又一遍地重複榮譽勳章獲得者的英勇事蹟，直到後勤兵也深受鼓舞。追悼會上，軍士長在士兵的遺像前舉行點名儀式，「待悲壯的氣氛感染每一個人，然後才演奏葬禮進行曲。」<sup>40</sup>在這些以符號和儀式為特徵的戰爭框架背後滲透著國家權力的運行和文化實踐，表明「國家的時空界限與其他表徵領域之間有一種親密的對應關係 (seamless correspondence)」<sup>41</sup>，為作為「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的民族國家提供了被不斷生產和複製的基礎。同時，士兵形象也頗具個人英雄主義特徵，往往擁有無可比擬的專業技能，快速精確、謙遜陽剛、自我犧牲，隨時準備在世界任何地方製造致命的暴力，「他們代表了一種強大的身體武裝，以對抗敵人的暴力威脅及戰鬥創傷」<sup>42</sup>。

再者，美國國家權力與創傷理論的合謀也有意識地控制著戰爭框架，使之成為國家暴力得以施展的隱秘工具。巴特勒指出，戰爭框架可以是「非物質意義上的思維具現」，凸顯出霸權意圖框定、排除、篩選、闡釋的「現實」。它可以「解釋誰的生命是生命，誰的生命只能淪為工具、目標、數字」<sup>43</sup>。長期以來，美國的戰爭框架佈滿了白人男性士兵的創傷記憶，讀者難以從其他視度來建構或回憶戰爭，形成「一種刺眼的缺席」<sup>44</sup>。進入新世紀，主流的反恐話語與戰爭策略一直試圖從公眾視野中抹除或淡化「他者」的可理解性 (intelligibility) 或脆弱性 (vulnerability)，「不在場」的伊拉克民族淪為非人化的神秘「他者」。小說中，美軍士兵將拉馬迪稱為邪惡之城，將伊拉克叛軍簡化為衝突交火排行榜上的一道道計數紅杠；或是「史酷比行動」中的狗；甚至換算為「零點七幾個人」，大概等於「一個軀幹加一顆頭，或者一條腿。」<sup>45</sup>心理學家阿爾伯特·班杜拉 (Albert Bandura) 指出「當與那些被剝奪了人性的人交往時，人們很少譴責懲罰行為，甚至還會為它辯護」<sup>46</sup>。循此邏輯，美國在軍事、政治、文學等多個話語場域的公共空間內選擇性地呈現生命及其形態，媒體的敘事框架淪為霸權戰爭機器的忠實附庸，不斷強化美國的受害者身份，擴大敵我關係的劃定範圍，讓大眾心安理得地接受美國對其他國家實施的戰爭暴行。

然而，克萊卻從嚴絲合縫的戰爭框架中開闢出異議的空間，借不同的敘述者之口揭示國家權力表徵的現實局限，進一步質疑創傷英雄神話的缺陷及矛盾。魯斯·拉赫迪 (Ruth Lahti) 指出「跨國戰爭象徵著一種環境闕限，在該環境中「民族國家」的邊界被最激烈地再現，也最模糊危險」<sup>47</sup>。換言之，在伊拉克戰場上，隱藏著國家權力和利害關係的戰爭知識體系與美軍士兵的真實體驗相悖，導致士兵對於戰爭和國家權力產生道德焦慮與信仰危機。短篇《火窯中的祈禱》中美國士兵羅德裏格斯在執行上級軍官的命令時瀕臨崩潰道：「我再也不相信這場戰爭了……我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決定一個人會被殺，又是什麼讓他活著。有時候你搞得一團糟卻安然無恙，有時候你做了正確的事卻有人死去。」<sup>48</sup>「煎熬」源於權力框架遮蔽了士兵對於戰爭現實的真實感知，「正義」、「意義」和「崇高」等愛國主義敘事在戰場上頻繁遭受拷問或質疑，正如隨軍牧師在日記裏寫道：我以為戰爭中至少會湧現高尚。我確信它的存在。但我看到的大多是平凡的人，想要行善，卻無情地被現實擊潰……他們渴望變得比環境更強硬，因此也更為殘忍<sup>49</sup>。

克萊力圖解構宏大的「戰爭英雄神話」，從小人物的視角尖銳地刺入士兵們複雜的內心世界。反恐戰爭並未賦予戰士們充分的勇氣與正義感，而是迫使其服務於美國這部「戰爭機器」對外輸出暴力以維護自身霸權的野心，正如作者借敘述者紮拉之口表明「誰在乎士兵們相信什麼？根本沒人在乎棋盤上的卒子認為某步棋下得怎麼樣或是為什麼要那麼下。」<sup>50</sup>換言之，美國的普通士兵們面臨既是戰爭創傷的「受害者」(the traumatized)，也是戰爭暴力的「施害者」(the traumatizing) 的身份危機。小說的最後，許多歸國老兵難以擺脫愧疚、恐懼、無助和焦慮等負面情緒，患有嚴重的 PTSD，踏上酗酒、涉毒、自殺或犯罪的「不歸路」；並且，美國政府所謂伊拉克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指控最終被證明是無端干涉他國內政，蓄意傷害他國人民的藉口，這嚴重破壞了伊拉克戰爭的合法性，導致美國民間反戰情緒高漲，軍民分隔 (the civilian-military divide)

日益嚴重,老兵們逐漸被排擠為美國社會的邊緣人群。

### 三、「山巔之城」的隕落:美國「後 9·11」時代的政治危機

透過伊拉克這個窗口,克萊既從多個維度勾勒了 21 世紀初美國歷史上最漫長的跨國戰爭的創傷圖景,同時其筆端也指向了更嚴肅的時代之思,即在對「他者」創傷的異質性與交互性的再現中反審美國在「後 9·11」時代的全球政治角色與危機。「山巔之城」(「city upon a hill」)的意象嬗變是一條貫穿美國歷史的紅線,含納美國人幾乎所有的民族精神起源與自我認知。美國思想史學家羅傑斯(Daniel Rodgers)在《山巔之城: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俗人佈道》(*As a City on a Hill: The Story of America's Most Famous Lay Sermon*)一書中認為「山巔之城」共經歷了「創生—挪用—再敘述」三個歷史階段:新英格蘭殖民時期,移民領導人約翰·溫斯羅普(John Winthrop)在其著名的佈道中引用聖經典故,提出「山巔之城」的偉大構想,賦予踏上未知大陸的新移民至高的宗教使命感與憂患意識。18 至 19 世紀,民族主義與愛國精神席捲大西洋兩岸,沉寂已久的「山巔之城」文本意蘊被挪用為國族構建和帝國征服與教化的神聖歷史隱喻與標準敘事。在冷戰背景下,雷根在總統任期內將其重塑為「一個渴望確保其實力和偉大性的國家的奠基性文本(a foundational text)」<sup>①</sup>,賦予古老神話在現代兩極格局中新的自由主義政治內涵。羅傑斯借鏡霍布斯鮑姆的歷史觀,指明「山巔之城」意象的形塑實則是一種「被發明的傳統」(the invented traditions),它用「過多想像的連續性將當代美利堅民族與某一歷史片段相勾連」<sup>②</sup>,形成一種連貫自足、靜態單一的元敘事(meta narration),由此成為「美國例外論」的濫觴,即以「世界的守護者」自居,規範其他國家的行為,代表世界最後與最好的救贖機會<sup>③</sup>。

這種例外主義對美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方面它塑造了美利堅民族無意識之中的開拓創新精神、道德優越感與救世主情結,服務於美國國家認同的需要。另一方面,美國人對外在世界的無知也被政治利用,為美國的干涉主義張目,引發非理性的災難。「9·11」事件發生後,美國對伊拉克的軍事入侵與民主重建即是基於這樣一種偏狹自傲的邏輯:恐怖分子對美國的攻擊是試圖摧毀世界上最明亮的自由民主燈塔,只有反恐戰爭才能推翻薩達姆政權,拯救苦難深重的伊拉克人民,只有美式民主才能調和伊拉克的民族創傷。然而,正如哈米德筆下的主人公昌蓋茲指摘美國:「您的國家對於別國的事務總是喜歡插手干涉,這是令人無法忍受的。越南、朝鮮、中東,再加上現在的阿富汗;在我出生和生長的亞洲大陸上所發生的主要衝突和對峙中,美國都扮演了中心角色。」<sup>④</sup>克萊在小說中也通過聚焦美國在伊拉克戰後區域重建工作,借由不同人物的主觀感發實現對「山巔之城」民主敘事的拆解。根據研究報告,由於多年的制裁和戰亂,伊拉克遭受了巨大損失,電力、水利、排汙、道路等基礎設施以及醫療、教育和公共運輸系統都亟需維護或重建。因此,美國留下一支 1.6 萬名由前戰鬥人員、軍事人員和公司承包商組成的文職部隊繼續完成重建任務<sup>⑤</sup>。在短篇《金錢作為一種武器系統》中,美國政府和地方議會忽視伊拉克的現實情況,照搬西方的民主發展模式制定了一套「在伊工作方針」:「改善經濟」、「賦予婦女權利」和「救助弱勢群體」。然而,美國重建人員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卻偏離原意,使「民主改造」面臨巨大的浪費與失控。首先,美軍重建隊伍的素質參差不齊,大多數成員缺乏專業的訓練。外事官員內森擁有的全部工作經驗僅限於幾個暑期實習;婦女扶助計畫的顧問辛迪使用穀歌搜索開展日常工作;老兵鮑勃對於伊拉克戰爭則持一種存在主義的觀點。克萊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尖銳地諷刺了大多數美國人為追求豐厚的年薪、漫長的休假或推進職業生涯來到伊拉克工作,與上述民主燈塔的使命觀大相徑庭。其次,他還揭露了民主改造中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盛行。戰後的伊拉克平民亟需婦女健康診所、清潔的水源以及灌溉系統等基礎設施建設,然而,受美國操縱的地方議會卻要求組



建婦女商業協會、推廣伊拉克寡婦養蜂專案以及舉辦青少年棒球聯賽，以滿足美國國會對伊拉克民主建設立竿見影的效果要求。鮑勃坦言：「[美國]大使館喜歡那些能支持政府‘在伊工作方針’的完整專案……寡婦專案就像金子一樣。加上地方議會的支持，我們可以說這是伊拉克人的自主專案。花費不超過兩萬五千元美元，可以輕鬆通過審批。」<sup>54</sup>小說中美國在伊拉克移植「美式民主」時嚴重脫離當地實情，造成原有秩序崩壞、社會分裂嚴重、經濟發展停滯，重建工作最終淪為一場鬧劇，民主願景在推諉責任、貪污納賄、鋪張浪費的沙地裏流失耗盡，充滿了腐敗的「西方殖民主義」色彩。

再者，克萊敏銳地覺察到美國國內「山巔之城」神話的隕落，借助軍民分隔現象喻指更嚴重的戰爭文化危機。正如他在接受採訪時指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美國軍隊和平民之間出現嚴重脫節」，小說中的美國民眾對於反恐戰爭也持有不同的認識與態度。其中一部分不容異見的公共利益維護者們痛恨戰爭，他們「不明白為什麼有人會參軍，不明白為什麼有人想擁有一支槍，更別說扣響扳機。」排名前五的紐約大學法學院高材生們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卻不知道海軍陸戰隊是幹什麼的，「很少有人關注戰爭的進展，大多數人的想法停留在‘那是個可怕的亂攤子，所以就別想那麼多了’。」<sup>55</sup>克萊在小說中凸顯了美國當代戰爭文化權威的雙重困境。一方面，隨著越戰後強制徵兵和抽籤制度 (selective service and draft lottery) 結束極大地改變了美國戰爭文化的道德景觀，訓練有素的職業軍人成為反恐戰爭的主力軍，他們參軍入伍更多的是為了享受更好的教育機會和薪酬補貼，由此，戰爭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外殼被進一步剝離。另一方面，與二戰和冷戰時期的「全面戰爭」(total war) 文化所投射出的全景視域不同的是，當代美國戰爭文化旨在使公民和消費者習慣於視伊戰為由志願軍在遠離大多數美國人的地方發動的戰爭。這種庸常邏輯會深化一種「社會結構瓦解下的原子化主體性」意識<sup>56</sup>，它阻礙了美國公眾的日常思考與道德批判，使其背離公民責任以及美國發動戰爭帶來的政治和經濟後果，折射出美國國內社會出現的巨大撕裂。

最後，克萊還在小說中指涉美國「後 9·11」時代愈演愈烈的種族矛盾和國家安全與信仰危機。短篇《心理戰》的主人公瓦吉赫是埃及科普特移民，信奉基督教，但因長相酷似穆斯林，從小在學校裏格格不入，被侮辱為「沙漠黑鬼」，飽受歧視。「9·11」爆發後，美國社會的「恐伊症」(Islamophobia) 加劇，瓦吉赫全家被當作潛在的恐怖分子，日常生活受到嚴密地審查監視。在機場安檢時，他們被拉到一旁從上到下搜身；入伍時，瓦吉赫被迫接受更為嚴格細緻的身份盤查。他的戰友特拉維斯的叔叔是一位建築師，為支持侄子參軍，他開始拒絕和穆斯林電工合作。克萊真實地再現了美國國內緊張的族裔關係與艱難的種族生存環境，鋒鏑直指恐怖襲擊之後美國頒佈的《美國愛國者法案》(USA Patriot Act) 和針對阿拉伯/穆斯林國家男性的「特別登記制度」(special registration)，這些法律賦予政府過量的執法特權，嚴重侵蝕了普通公民的自由與隱私，使阿拉伯裔和穆斯林美國人直接淪為種族歧視與創傷的受害者，最終都破壞了「山巔之城」民主平等的多元價值觀。值得一提的是，在短篇《除非在該死的胸口》中，朋友保羅向敘述者講述了在美國中學公益任教時親眼目睹學生在校園持刀行兇的經歷，坦言「美國沒救了，兄弟，相信我，你不願當那個從下沉的船裏往外舀水的人。」小說描繪保羅所居住的公寓「散發著精神分裂者的氣質，牆上貼著‘討伐體制樂隊’的舊海報、加框的《紐約客》封面以及中國西藏的經幡。」<sup>57</sup>這三種文化符號分別代表著左翼政治文化、無黨派和自由派傾向以及藏傳佛教信仰，象徵美國國內上帝和國家信仰的衰落。克萊在此解構了主導的美利堅例外論觀念，從底層視角重新審視美國昔日的建國精神基礎，透露出「山巔之城」民主神話的危機。

## 結語

克萊在一次訪談中表示：「我們傾向於想像戰爭是某種神秘之物，而這種闡述其實破壞了這種經歷——

通過借助不同的視角,我想為讀者打開一個空間,讓他們去比較,去判斷,去參與。」正是通過《重新派遣》一書,克萊重繪了反恐戰爭複雜的跨國創傷圖景,解域化地創造出新的文學公共空間,用於表達和敘述未被美國官方認可的「後9·11」伊戰敘事,即沉默或邊緣化的他者的創傷經歷,反映出長期以來中東地區飽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上的帝國主義式滲透和侵略,並自反性地揭櫫美國「山巔之城」神話隕落背後深重的社會矛盾與政治危機,召喚讀者重新審視美國發動反恐戰爭與實施中東民主重建的合理性與正義性,表達了作家強烈的反戰思想以及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希冀。

## 注釋

- ① Turrentine, J. (2014). Review: *Fives and twenty-fives* by Michael Pitre: a tale of dangerous duty in Iraq. *Washington Post*.
- ②④⑪ Luckhurst, R. (2012). In war times: fictionalizing Iraq.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53(4), 713–737.
- ③⑦ Deer, P. (2016). Mapping contemporary American war culture. *College Literature*, 43(1), 48–90.
- ⑤ Bollinger, L. (2014). A broader scope. *War,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26(1), 1–15.
- ⑥ Sullivan, A. T. (2015). Reviews: *Redeployment*, Phil Kla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Iraqi Studies*, 9(2), 139–158.
- ⑧ 柳曉,謝俊彥:《當代美國戰爭文化的縮略圖——伊拉克戰爭小說〈重新部署〉評析》,《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16年第4期,頁26–33。
- ⑨ 但漢松:《美國「後9·11」戰爭書寫的真實闕限與倫理可能——論菲爾·克萊的〈重新派遣〉》,《當代外國文學》2017年第4期,頁20–27。
- ⑩ 曾豔鈺:《當代美國戰爭小說中的跨國景觀與政治》,《外國文學》2017年第1期,頁120–131。
- ⑫ Brown, L. S. (1995). Not outside the range: one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psychic trauma. In: C. Caruth, ed.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⑬⑰⑳ Duvall, J. N. & Marzec, R. P. (2011). Robert P. M. narrating 9/11. *Modern Fiction Studies*, 57(3), 381–400. Mishra, P. The end of innocence. *The Guardian*, 19 May 2007.
- ⑭ Radstone, S. (2007). Trauma theory: contexts, politics, ethics. *Paragraph*, 30(1), 9–29.
- ⑮ Gray, R. (2008). Open doors, closed minds: American prose writing at a time of crisis.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21(1), 128–151.
- ⑯ Rothberg, M. (2008). A failure of the imagination: Diagnosing the post-9/11 novel: a response to Richard Gray.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21(1), 152–158.
- ⑰ Vertovec, S. (1999). Conceiving and researching transnationalism.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2(2), 447–462.
- ⑱ Roy, A. (2017). *The ministry of utmost happiness*. London: Penguin.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 菲爾·克萊著,亞可譯:《重新派遣》,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版。
- ㉑ Ricks, T. (2010). *The gamble: general Petraeus and the American military adventure in Iraq*. London: Penguin.
- ㉒㉓ 莫欣·哈米德著,吳剛譯:《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版。
- ㉔ Herman, J. L. (2015). *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from domestic ability to political terror*. New York: Basic Books.
- ㉕ 即「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指一種與嚴重創傷事件有關的焦慮症,其特點是過度緊張、創傷事件入侵或再體驗,持續的回避,以及消極的認知和情緒。
- ㉖ Alexander, J. C. (2004).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 ㉗ Hajji, 又稱 Hadji, Haji, Alhaji, Al hage, Al-hajj or El-Hajji, 對穆斯林朝覲者的尊稱。
- ㉘㉙ Scranton, R. The trauma hero: from Wilfred Owen to “Redeployment” and “American Sniper”.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25 Jan. 2015.

- ③ Sacks, S. First-person shooters: what's missing in contemporary war fiction. *Harpers*, 2 Aug. 2015.
- ③⑥ 轉引自朱迪斯·巴特勒著,何磊,趙英男譯:《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與暴力的力量》,河南大學出版社 2013 年版,頁 114。
- ③⑦ Clausewitz, K. V. (1984). *On war*. Ed. Howard M, & Paret, P. New Jersey: Princeton UP.
- ③⑧④ 朱迪斯·巴特勒著,何磊譯:《戰爭的框架》,河南大學出版社 2016 年版。
- ③⑨ 以賽亞·伯林著,胡傳勝譯:《自由論》,譯林出版社 2011 年版,頁 355。
- ④① Dimock, W. C. (2006). *Through other continents: American literature across deep time*. New Jersey: Princeton UP, 3.
- ④② Theweleit, K. (1989). *Male fantasies, Vol. 2: male bodies-psychoanalyzing the white terror*. Trans. Carter E, & Turner, C.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 ④④ Peebles, S. (2011). *Welcome to the suck: narrating the American soldier's experience in Iraq*. New York: Cornell UP.
- ④⑥ Bandura, A. (1990). Selective activation and disengagement of moral control.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6(1), 27-46.
- ④⑦ Lahti, R. A. H. (2012). Gesturing beyond the frame: transnational trauma and US War fiction.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American Studies*, 4(2), 1-21.
- ⑤①② Rodgers, D. (2018). *As a city on a hill: the story of America's most famous lay serm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P.
- ⑤③ Madsen, D. L. (1998).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Edinburgh: Edinburgh UP.
- ⑤⑤ Lutz, C. Reconstructing Iraq: The last year and the last decade. *Wat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Brown University, 8 Mar. 2013.
- ⑤⑧ MacPhee, G. (2015). Arendt after Jerusalem. *New Formations*, 85, 246-252.

(Editors: Bonnie WANG & JIANG Qing)